



二十世紀晚期 中國小說倫理

◎司敬雪 著

本書針對二十世紀晚期中國小說的倫理
問題做入門性的探窺。



二十世紀晚期 中國小說倫理

◎司敬雪 著

本書針對二十世紀晚期中國小說的倫理問題做入門性的探窺。

二十世紀晚期中國小說倫理 / 司敬雪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9.07

面；公分.-- (語言文學類；PG0270)

BOD 版

ISBN 978-986-221-264-6 (平裝)

1.中國小說 2.現代小說 3.文學評論

820.9108

98011970



語言文學類 PG0270

二十世紀晚期中國小說倫理

作 者 / 司敬雪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藍志成

圖文排版 / 陳湘陵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9 年 7 月 BOD 一版

定價：33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9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導論

20 世紀是世界不斷走向一體化的時代，同時也是「『世界文學』初步形成的時代」。¹在這樣一個大碰撞、大融合、大分化的世紀裏，中國作家作為後發民族的一分子，感受過巨大的鼓舞，更品味了落後者無法排遣的屈辱與痛苦。他們也曾消沉過，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忍受著巨大的精神焦慮而埋頭創作。他們的不懈努力使 20 世紀中國小說史上出現了幾個創作繁盛期。其中之一就是 20 世紀晚期。

從 1980 年代初開始，20 世紀進入它的晚期階段。在這個逼近世紀末的時段裏，中國小說創作逐漸走出「文革」專制意識形態的陰影，呈現出名家輩出、佳作迭現的爆炸勢頭。1981 年 1 月，趙振開（北島）的中篇小說《波動》在《長江》第 1 期發表，標誌著「烏托邦神話」的敗類和「個人主體性的回復」²，同時也標誌著一個小說創作繁盛期的到來。自此以後，一個又一個優秀作家的名字響貫讀者的耳膜，如鐵凝、莫言、余華、劉震雲、王安憶、嚴歌苓等，一部又一部優秀小說作品叩開讀者的心扉，如《哦，香雪》、《紅高粱》、《現實一種》、《一地雞毛》、《小鮑莊》、《雌性的草地》等。這些優秀的作家和他們的小說共同組成 20 世紀晚期文學創作中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如何來梳理、評價 20 世紀晚期中國作家豐富多彩的創作實踐和他們形態各異的小說作品呢？最先挑動人們批評神經的自然就是「文學性」話語。它在 1980 年代前期就被移植到中國的文學批評界。「文

學性」英文寫作「Literariness」，最早由俄國形式主義文學批評家雅各遜（Roman Jakobson）創造出來。他在 1919 年提出，「文學研究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即使一部特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那種東西」。³「文學性」一詞體現了雅各遜對文學形式和文學獨創性的熱情關注。這種熱情在隨後崛起於英美的新批評派的詩學體系中得到鄭重地傳承與光大。新批評派在 1920、30 年代迅速發展壯大，1940 年代構築起自己的理論體系，並最終體現在韋勒克和沃倫 1942 年撰寫《文學理論》一書中。他們將文學研究分為關於文學與歷史、宗教、政治、倫理間外在關係的外在部分和關於文學所獨有的情節、隱喻、象徵、意象間內在關係的內在部分，並從這一著名區分出發，將材料考據、思想分析、歷史考察等傳統社會學批評方法擯除於文本研究之外，使批評家更加注重文學作品的藝術特色與審美結構等所謂「文學性」的研究。1984 年中國文學界展開的文藝學方法論的討論，是西方「文學性」話語移入中國的開始。經過一年多的熱烈討論，到 1986 年，「文學性」話語在批評界已明顯佔據優勢地位，「人們普遍把審美特徵作為文學藝術的重要標誌，文本分析成為文學批評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傳統文學批評所強調的政治內容和社會生活現實往往被認為是沒有觸及文學的本質。各種各樣的形式分析方法，審美批評、結構批評、格式塔藝術心理學、佛洛伊德心理分析、敘事學、文體語言批評，一時成為主流。」⁴

首先應該肯定地說，以「文學性」話語為線索來梳理、評價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有一定的合理性。「文學性」作為一個批評話語包含著鮮明的形式主義主張，它在 1980 年代前期移入中國文壇後，確實對小說創作的健康發展起到過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它促進

了作家完善小說敘述形式、提高作品藝術品質的文學意識的自覺。其最醒目的成果就是馬原的「敘述圈套」和先鋒小說的脫穎而出。馬原是 1980 年代最早對「文學性」話語感興趣的作家之一。他的「敘述圈套」、「以引人入勝的方式消解了人們所熟悉的現實主義手法所造成的真實幻覺」⁵，激發了作家們尋求個性化敘述方式的熱情，為小說創作多元化格局的出現準備了條件。而以余華、蘇童等為代表的先鋒作家則將「文學性」話語所宣導的形式探索推向極致。他們早期的代表作品《河邊的錯誤》、《褐色鳥群》等，以其精心構建的敘事迷宮讓讀者充分領略到精緻的敘述形式所帶來的審美愉悅。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文學性」話語還有效地扼制了專制意識形態話語對小說創作的強權宰製，暗中順應了小說創作亟待拓展自我生長空間的歷史需求。「的確，八十年代的主要思想傾向，是要把個人從僵化的政治、思想和經濟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是當時人們對自由的基本理解，因此，整個八十年代的思想的重心，可以說就是強調人的內心世界的重要性：一方面強調人的內心世界，以及那些體現這個內心世界的抽象的精神價值；另一方面貶低政治和經濟因素，覺得它們純粹是束縛性的事物。……而八十年代的那些新的文學思想和表達形式，例如『向內轉』的觀念，對語言的新的認識和運用，都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形成的。」⁶作為 1980 年代小說批評的親歷者，王曉明和蔡翔先生的這段話說得非常中肯。從中可以看出「文學性」這個曾經被很多人當作純粹形式主義的話語所隱含的意識形態性。它並不僅包納了 1980 年代作家在經歷了 1970 年代文學的長期荒涼之後對小說形式、藝術品質的渴求之情，更重要的是它還包納了處於話語劣勢的個人向處於話語強勢的專制意識

形態追討話語權的策略意圖。在 1980 年代，特別是 1980 年代前期，儘管「文革」專制統治已經告終，但專制意識形態的影響仍十分巨大，專制意識形態話語仍處於強勢地位，個人並沒有獲得充分表達自己價值觀念的權力，個人話語仍處於十分惡劣的弱勢地位。為了向專制意識形態追討話語權，個人不得不採取一些策略性的舉措，而「文學性」話語的張揚就是其中一種。通過「文學性」話語的張揚，那些包含專制意識形態話語而形式粗糙的小說逐漸被逐出讀者的視野，而專制意識形態話語也慢慢喪失其原有的強勢地位，個人話語則在由此所騰出的空間裏一點點發展起來。因此運用「文學性」話語來梳理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特別是 1980 年代的小說創作，會得出許多有價值的結論。

但是，也不得不承認，「文學性」話語只能部分地涵蓋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所進行的文學探索。如果僅用「文學性」話語作為批評尺度來考量 20 世紀晚期的小說創作，特別是 1990 年代的小說創作，就會遮蔽掉它所取得的很大一部分文學成就和存在的問題。因為「文學性」話語畢竟只是一套關涉敘述形式的分析範式，它無力梳理、甄審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所包含著的政治、經濟、社會、倫理等豐富的思想問題。前面提到「文學性」話語在 1980 年代特定思想環境下起到過抵拒專制意識形態霸權的侵凌，促進個人話語成長的作用，這似乎意味著它在形式之外兼具內容指涉功能。但是，它所具有的指涉小說內容的功能，是 1980 年代前期專制意識形態話語過分強大背景下，個人話語為拓展自己的生長空間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策略性借用，是含糊的、錯位的，它在挫敗專制意識形態話語霸權的同時，也暗含著將個人話語拖入爛泥潭的危險性。而這種潛

伏的危險性不幸在 1990 年代初成為現實。曾經十分活躍的批評界忽然患了失語症，面對小說創作，他們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大家都切身體會到，我們所從事的人文學術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氣』，而是陷入根本的危機。」⁷批評界的無所適從其實深層折射出的是文學性話語的失效和作家創作思想的混亂。因此，用「文學性」話語為線索來梳理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只能是一種局部性的梳理。它在照亮一部分文學真實的同時，也遮蔽掉更大一部分文學真實。

那麼，還有沒有其他可以用來梳理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的批評話語呢？目前越來越受到國內批評界關注的「文化研究」話語應該是比較有用的一種。與「文學性」話語一樣，「文化研究」話語也是舶來品。它 1964 年發軔於英國伯明罕大學，「經過幾十年的艱辛耕耘，終於從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開始，逐漸確立了自己在當代學術界應該具有的重要位置，與後現代主義一道成為 20 世紀末期的兩大主潮。」⁸1990 年代末，李陀、劉象愚、羅鋼和周憲等翻譯、介紹了一部分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論著作，「文化研究」話語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成為一種重要的批評方法。2003 年 8 月王曉明、蔡翔先生聯手在《當代作家評論》上開設「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專欄，更是明確要將文化研究的方法運用到文學批評中去，以加強文學批評的批判精神，積極回應社會巨變的挑戰。

相較於「文學性」話語，「文化研究」話語的優勢在哪裡呢？在於它擁有鮮明的批判意識和現實針對性。「文化研究的精髓，卻是一種敏銳、開放、具有鮮明的批判意識的學術精神：不受固有的學科界限的束縛，直面當代社會的重大問題，努力去破解各種新的支配和壓抑機制的運行邏輯」。⁹王曉明和蔡翔先生在 1980 年代本來都是

堅定的「文學性」話語的守護者，之所以到 21 世紀初轉變成「文化研究」話語的積極宣導者，正是由於他們於深味了「文學性」話語回應社會現實的無力感後，卻在「文化研究」話語中發現了批判現實的思想活力。「到了 1990 年代，那個在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醞釀的巨大的社會變化，直逼人們眼前，或者說開始被人們充分意識到了。這結果就是發現，面對首先是經濟生活、然後是與經濟生活聯繫在一起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巨大變化，你再要像 80 年代那樣，繼續把『人』從具體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當中拔出來，以此求取自由和解放，是明顯不夠了，甚至可能是走錯了方向。……一定還得有打破學科界限，能真正綜合地來分析、認識今天的社會現實（包括文學現實）的思想和學術活動。對你我這樣出身文學專業的人來說，比較合適的一個做法，就是借助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¹⁰

以前批評界用「文學性」話語來梳理 20 世紀晚期的小說創作已經做得很多了，人們對小說形式的重要性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自覺，對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所進行的豐富多樣的形式探索也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認識。但是由於批評界過於強調「文學性」話語的理論價值，甚至把它塑造成一個批評神話，無形中忽視了小說內容的重要性，對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中所包含的繁複銳利的現實思考也缺乏應有的認識。而且，由於批評界拋開小說內容而孤立地來分析小說中的形式因素，還會造成對形式因素的價值的錯誤估定。比如王曉明先生就曾經指出：「1987 年以來，小說創作中一直有一種傾向，就是把寫作的重心從『內容』移向『形式』，從故事、主題和意義移向敘述、結構和技巧，產生一大批被稱為『先鋒』或『前衛』的作品。……明明是在後退，卻要貼上一大堆外國的招牌來粉飾、

自欺，那就有點可憐了。我覺得這種後退而自欺的現象，把這個時代人文精神的危機表現得再觸目也沒有了。」¹¹所以，以目前的批評狀況而言，運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對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的內容進行一些切實的政治的、經濟的、倫理的分析，是更加有必要的。

正是基於以上的考慮，我開始了本書的寫作。而由於 20 世紀晚期小說創作所包含的內容太豐富了，對它作一個全面的分析非我目前的學術積累和研究能力所及，因此只選擇其中一個很小的方面——倫理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即使就這個小的方面所進行的探討，也是很不完備的。因此，本書只能算是一個 20 世紀晚期小說倫理的入門性的探窺。

注釋：

- ¹ 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 年第 5 期。
- ²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 186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版。
- ³ 雅各遜：《現代俄國詩歌》，轉見陸貴山主編《中國當代文藝思潮》第 33 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
- ⁴ 周小儀：《從形式回到歷史》。
- ⁵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 291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9 年版。
- ⁶ 王曉明、蔡翔：《美和詩意如何產生——有關一個欄目的設想和對話》，《當代作家評論》2003 年第 4 期。
- ⁷ 張汝倫語，見張汝倫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與如何可能》，轉引自《讀書》1994 年第 3 期。
- ⁸ 蕭俊明：《文化研究的發展軌跡》，《國外社會科學》2002 年第 1 期。
- ⁹ 王曉明、蔡翔：《美和詩意如何產生——有關一個欄目的設想和對話》，《當代文學評論》2003 年第 4 期。
- ¹⁰ 王曉明、蔡翔：《美和詩意如何產生——有關一個欄目的設想和對話》，《當代作家評論》2003 年第 4 期。
- ¹¹ 王曉明語，王曉明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轉引自《上海文學》1993 年第 6 期。

目次

導 論	i
-----------	---

內篇

第 一 章 眾聲喧譁	3
第 二 章 岩石沉沒	27
第 三 章 「頽加蕩」氣	43

外篇

第 四 章 悠揚的笛聲——鐵凝	65
第 五 章 英雄的終結——嚴歌苓	85
第 六 章 遊戲與破綻——王朔	107
第 七 章 呼嘯的沉默——余華	129
第 八 章 粉紅的愉悅——蘇童	147
第 九 章 單位與雞毛——劉震雲	163
第 十 章 城市的星光——邱華棟	183

第十一章	肋骨的反叛——衛慧.....	201
第十二章	拯救第三種貨幣——三駕馬車	219
第十三章	誰能帶小豬回家——北村	237
後 記		253

内篇

第一章 眾聲喧譁

縱觀 20 世紀晚期中國小說中的倫理訴求格局，完全可以用「眾聲喧譁」來概括。從國家到個人，從男性到女性，從城市到鄉村，從世俗到神界，每一種倫理主體都出現在小說中，都在大聲宣講著自己的權利與要求。「眾聲喧譁」本是一些批評家用來指認 1990 年代中期的文學形勢的，比如陳思和就在他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寫道：「經歷了 80-90 年代從共名狀態向無名狀態的轉化，90 年代中期文學創作出現了一種眾聲喧譁的多元格局」。¹不過，我認為它也可以借用來指認 20 世紀晚期中國小說中的倫理訴求狀況。有人也許會以為 1980 年代小說中的倫理訴求之聲只有文化精英一家，構不成眾聲喧譁的局面。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如果稍微冷靜一點，耐心翻一翻 1980 年代的小說作品，就會發現其所包含的倫理聲音並不單調，而是相當豐富、駁雜的。只不過這種狀況在進入 1990 年代後愈加明顯罷了。

眾聲喧譁是對文革時期極權統治下「萬馬齊喑」的一個反動。極權政治標榜純而又純的倫理風尚，並對任何含納所謂「倫理雜質」的作品及其作者進行無情批判與打擊。在如此苛厲的文藝倫理管制下，「大多數作家、藝術家在『文革』期間，受到各種迫害。他們中的許多人在不同範圍受到『批鬥』，遭受人身污辱，有的被拘禁、勞改。一些作家因此失去生命。」²而且，極權政治嚴密控制倫理聲音的生產權，不允許任何帶有雜質的倫理聲音進行生產與傳播。這一

倫理控制的實施，剝奪了作家發佈個人倫理聲音的權利，也剝奪了文學刊物傳播非極權政治倫理聲音的權利。「『文革』期間，原來的作家的寫作和作品的發表，需要獲得允許，重新取得資格。『文革』開始的最初幾年裏，除極個別作家（郭沫若、浩然，以及一些工農兵出身的作家，如胡萬春、李學鼈、仇學寶等）仍可以發表作品外，作家普遍失去寫作資格。……從 1966 年 7 月開始，全國的文學刊物，除《解放軍文藝》（1968 年 11 月到 1972 年 4 月也曾一度停止出版）外，都被迫停刊，這包括由中國作協和上海作協分會主辦的幾份最有影響的刊物：《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收穫》、《上海文學》等。」³ 文革時期的極權政治「罷黜百家」的倫理管制，造成假、大、空的倫理聲音獨播天下的專制局面。這種畸型的倫理生產與傳播方式，使極權政治倫理獲得了一統萬方的表面勝利，但同時也埋伏了它無以避免的潰敗命運。因為這種生產與傳播方式僅僅封塞了各種階層、各種個體的倫理需求的表達管道，卻不可能從根本上消滅他們作為特定階層、特定個體的內在的倫理需求。

社會各種階層、各種個體內在的倫理需求越被極權政治擠壓，便會越強烈地滋生反叛它的思想。當擠壓達到極限時，反叛的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實際的行動。這種對極權政治的反叛表現在文學上，就是文革期間「地下文學」的出現。「它們不同程度具有『異端』因素，寫作和『發表』都處於祕密、半祕密的狀態中。作品常見的存在方式，是以手抄本形式在讀者中流傳。」⁴ 比如張揚的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它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讀者中廣泛流傳。小說中所傳達的對知識和知識份子所具有的寶貴價值的肯定，對男女間美好愛情的讚頌，是對否定知識和踐踏人性，